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集刊



产业组织评论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Review

第16卷 第4辑 (总第52辑) 2022年12月

Vol.16 No.4 (Gen.52) Dec. 2022

于 左 主编



- ◎ 杨一飞 冯栋琨
国内大循环与产业数字化转型
- ◎ 何小钢 罗欣 何杨
数字革命与银行绩效
- ◎ 吕承超 何加豪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再生产的空间一体化及其网络关联特征比较
- ◎ 刘翠花 张静 丁述磊
数字经济对我国就业量质协调发展的影响研究
- ◎ 韩永辉 麦靖华 张帆 罗瑞霖
全球价值链位势研究的综述与展望

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产业组织评论. 第16卷. 第4辑: 总第52辑 / 于左
主编. —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23. 3

ISBN 978 - 7 - 5218 - 4632 - 4

I. ①产... II. ①于... III. ①产业组织 - 研究 IV.
①F062.9

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 (2023) 第 048514 号

责任编辑: 李 雪 凌 健

责任校对: 易 超

责任印制: 邱 天

产业组织评论

第16卷 第4辑 (总第52辑) 2022年12月

于 左 主编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28号 邮编: 100142

总编部电话: 010 - 88191217 发行部电话: 010 - 88191522

网址: [www. esp. com. cn](http://www.esp.com.cn)

电子邮箱: [esp@ esp. com. cn](mailto:esp@esp.com.cn)

天猫网店: 经济科学出版社旗舰店

网址: [http: //jjkxcbs. tmall. com](http://jjkxcbs.tmall.com)

北京财经印刷厂印装

787 × 1092 16开 12.75印张 250000字

2023年3月第1版 2023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 - 7 - 5218 - 4632 - 4 定价: 49.00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010 - 88191510)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打击盗版 举报热线: 010 - 88191661)

QQ: 2242791300 营销中心电话: 010 - 88191537

电子邮箱: [dbts@ esp. com. cn](mailto:dbts@esp.com.cn)

目 录

国内大循环与产业数字化转型	杨 飞 冯栋琨 (1)
“一带一路”倡议下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与服务海外中资实体企业研究	鲍 洋 鲍志斌 陈 冉 (23)
数字革命与银行绩效	
——徒有虚名还是如虎添翼	何小钢 罗 欣 何 杨 (46)
区域间劳动力流动与中国制造业空间结构演变	
——基于技能岗位匹配视角的分析	李晓颖 石连娇 王 欢 (73)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再生产的空间一体化及其网络关联特征比较	吕承超 何加豪 (91)
基于房价失调与房价增长惯性的利率时变反应研究	朱奎全 郭 凯 陈志远 (117)
数字经济对我国就业量质协调发展的影响研究	刘翠花 张 静 丁述磊 (134)
全球价值链位势研究的综述与展望	
——基于 CiteSpace 的知识图谱分析	韩永辉 麦靖华 张 帆 罗瑞霖 (161)

CONTENTS

Domestic Big Circulation and Industry Digital Transformation	
.....	YANG Fei FENG Dongkun (21)
The Study on the Banking Industry's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 and Serving Overseas Chinese-funded Entity Enterprises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	BAO Yang BAO Zhibin CHEN Ran (44)
Digital Revolution and Bank Performance: in Name or A Powerful Force	
.....	HE Xiaogang LUO Xin HE Yang (71)
Interregional labor mobility and Changes in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Analysis Based on the Matching of Skills to Tasks	
.....	LI Xiaoying SHI Lianjiao WANG Huan (89)
The Spatial Integration of Reproduction and the Comparison of Network Correlation Characteristics under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of "Dual Circulation"	
.....	LV Chengchao HE Jiahao (115)
Research on the Time-varying Response of Interest Rate Based on House Price Misalignment and House Price Growth Inertia	
.....	ZHU Kuiquan GUO Kai CHEN Zhiyuan (132)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Digital Economy on the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Coordination of Employment Development in China	
.....	LIU Cuihua ZHANG Jing DING Shulei (159)
Global Value Chain Position Research: A Literature Review	
.....	HAN Yonghui MAI Jinghua ZHANG Fan LUO Ruilin (195)

全球价值链位势研究的综述与展望

——基于 CiteSpace 的知识图谱分析

韩永辉^{1,2} 麦靖华¹ 张帆³ 罗瑞霖⁴

- (1.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 广东 广州 510420;
2.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北京 100732;
3.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研究中心, 广东 广州 510006;
4.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济贸易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6)

[内容提要] 生产过程碎片化、分散化以及世界格局深刻演变冲击当前国际贸易架构体系, 全球价值链位势布局面临重大影响。本文借助 CiteSpace 文献计量分析工具, 以 2021 年以前^①有关全球价值链位势的 1942 篇中外文文献为研究对象, 运用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探究全球价值链位势的研究脉络和热点演进, 提出了全球价值链位势研究的测算框架, 并归纳总结国家全球价值链位势格局演变、位势变动影响因素以及位势跃升战略。本文研究发现: (1) 全球价值链位势测算框架主要包括两个分解模型以及三个主流核算方法。其中, 两个分解模型包括总出口分解模型和生产分解模型; 三种主流核算方法分为全球价值链位置指数、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和上游度指数。(2) 全球价值链位势的国家格局呈现发达国家“主导支配”和发展中国家“低端锁定”两个特征。(3) 影响全球价值链位势变动的因素可以分为要素禀赋因素和发展环境因素, 要素禀赋因素包括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外商直接投资和技术创新, 发展环境因素包括营商环境、对外开放水平和国内生产配套水平。(4) 全球价值链位势跃升战略可以分为内部提升战略和外部优化战略两大类型,

[基金项目] 贵州省 2022 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课题“贵州深化与粤港澳大湾区合作的影响机理与实施路径研究”(22GZZB01)。

[作者简介] 韩永辉, 男, 1986 年出生, 广东佛山人,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麦靖华, 女, 1997 年出生, 广东广州人,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张帆, 男, 1992 年出生, 广东佛山人,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研究中心讲师; 罗瑞霖(通讯作者), 男, 1999 年出生, 湖南永州人,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济贸易学院助教。

① 中文文献的检索时间为 2004~2021 年, 外文文献的检索时间为 1994~2021 年。余下同。

内部提升战略可以分为禀赋利用、创新驱动和国内价值链构建战略；外部优化战略主要涉及对外投资、制度型开放和产业转移战略。本文为后续全球价值链位势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提供了导向性指引。

[关键词] 全球价值链位势；国际分工体系；文献计量

一、引言

随着产品生产的全球性碎片化不断深入，国际分工体系成为连接各国经济并实现全球经济发展的关键（Gereffi, 2013；王直，2015）。由跨国公司所主导的国际分工由产业内转变为产品内分工，产品生产过程的组织和管理被分割为中间品和最终品生产、组装、配送、营销、服务、设计和研发等不同的环节、任务和活动（韩永辉，2017）。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配置不同环节，全球价值链分工参与者实际上承担的是产品价值链的部分工序或环节，国家或地区在很大程度上根据自身承担环节对产品价值增值的贡献获取贸易收益，因此国家和地区的全球价值链位势存在差异。全球价值链位势越高的部门对经济增长发展的贡献越大，意味着出口增长更多是建立在国内生产能力基础上，更容易在全球价值链上获取利益。在国际环境复杂多变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进入系统性调整、变革、重构期，国家、地区、产业和企业的全球价值链位势研究成为了学术界和实践界备受关注的问题。在理论上，尽管学者对全球价值链位势研究已经相当成熟和复杂，但学界对于全球价值链位势研究的关键概念尚未形成一个系统的、清晰的认识，未能对全球价值链位势变量进行结构性解释，对于全球价值链位势的国家格局演变、影响要素和跃升战略选择，现有理论仍有未臻完善之处，位势测算基础模型甚至与全球价值链位势发展现状存在不完全对应、甚至是矛盾之处，出现结论“莫衷一是”困境，现有全球价值链位势研究的理论体系建构未臻完善（倪红福，2019）。在现实中，部分企业充分发挥自身优势，通过国际化经营和生产转移等方式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并逐渐占据全球价值链高位势的同时，也有众多中国企业未能发挥全球价值链战略优势而遭受发达国家跨国公司“锁定”和“俘获”，陷于全球价值链低附加值环节、低端位势（刘志彪和张杰，2007；吕越等，2018）。因此，系统全面地探究全球价值链位势相关研究的演变趋势和发展脉络，对于解决中国企业“低端锁定”的问题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贡献。

相较于以往的文献研究，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1）基于文献计量和知识图谱工具，综合运用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全面剖析全球价值链位势发展格局，深化拓展既有研究成果的度量视角。（2）基于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研

究视角提炼出既有研究对全球价值链位势的核心解读,系统辨析其变迁过程和演化脉络,探究更为科学全面的全球价值链位势的格局演变、影响因素和跃升战略阐释。(3)构建全球价值链位势的研究逻辑框架,基于既有文献研究资料归纳总结全球价值链位势的国家格局演变、具体影响因素和跃升战略设计,以揭示全球价值链位势格局的演变特征、影响要素和升级路径。(4)构建全球价值链位势核算的逻辑框架,揭示全球价值链位势核算的基础模型和实证应用方法。本文有助于学界和实践界在此基础上把握全球价值链位势既有研究成果和发展演化特征,更好地开展相关研究。

本文剩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计量及其可视化分析;第三部分是厘清并系统性归纳全球价值链位势核算方法;第四部分是阐述全球价值链位势的格局演变、影响因素和跃升战略;第五部分是结论与展望。

二、文献计量分析

文献计量分析强调以数理统计方法考察文献的总体特征,量化揭示研究领域发展规律,进而实现对该研究领域现状及发展趋势的科学描述与评价(邱均平和王曰芬,2008)。基于文献计量分析方法,本文运用 CiteSpace5.8 软件对文献数据进行可视化分析,以知识图谱形式综合性呈现全球价值链位势领域研究文献的重要议题、发展规律和知识结构,利用多元、分时、动态的引文分析可视化语言以及空间布局将该领域的演变历程展现在知识图谱中,有效地帮助学术界和政治界掌握该领域的知识基础(李杰和陈超美,2016)。研究数据来源于 CNKI 和 Web of Science 核心数据库。设定样本时间跨度为 2021 年之前,能够基本涵盖全球价值链位势相关文献。根据全球价值链位势研究文献主题检索常见的同义词替换习惯,本文将中文数据库 CNKI 文献检索的检索条件主题词设置为“全球价值链位势”+“全球价值链位置”+“全球价值链地位”+“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期刊限定为 CSSCI,初步得到文献 812 篇。英文数据库 Web of Science 的搜索主题词则设置为“Global Value Chain”和“GVC”,期刊限定为 SSCI,初步得到文章 4059 篇。中英文文献类型均设定为论文,为进一步保证文献数据样本的有效性和可信性,本文逐篇剔除与文章主题不相关的文献,并且在 CiteSpace 软件中使用“去重”功能,经过逐篇检索和筛选,最终分别检索到 736 篇和 1206 篇中外文文献。本文基于 1942 个数据样本,从关键词共现分析、作者共现分析和高被引文献分析三个维度进行文献计量分析。

(一) 关键词共现分析

关键词表征该领域研究内容的概念、词语以及术语,是研究文章核心议题和核心概念的高度概括知识节点,本节将关键词演变态势以时区变化

共现图谱的形式展现,通过观测关键词词频和中心度^①,分析学界研究方向和研究前沿范畴,辨析全球价值链位势测算研究热点和领域偏好的动态演变。

中文研究方面,图1所示为中文研究关键词共现图,可以看出中文研究从“全球价值链位势”主要议题延伸,研究早期主要围绕产业集群、升级、全球生产网络和生产环节等话题展开,着重探索研究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位势的影响因素、升级战略。随着位势测算的方法逐渐成熟,学界涌现基于增加值贸易、贸易增加值等位势测算相关核心概念的研究,同时开始关注“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中美贸易争端等议题。在表1所列频次前15名的关键词中,有10个中心度大于0.1的关键节点:全球价值链、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产业升级、贸易增加值、“一带一路”、垂直专业化、全球价值链位置、升级和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整体而言,中文文献对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位势攀升和转型升级的议题较为关注,着重于系统科学地测算中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并提供应对低端锁定以及中美贸易摩擦等危机的“中国特色”升级战略路径和建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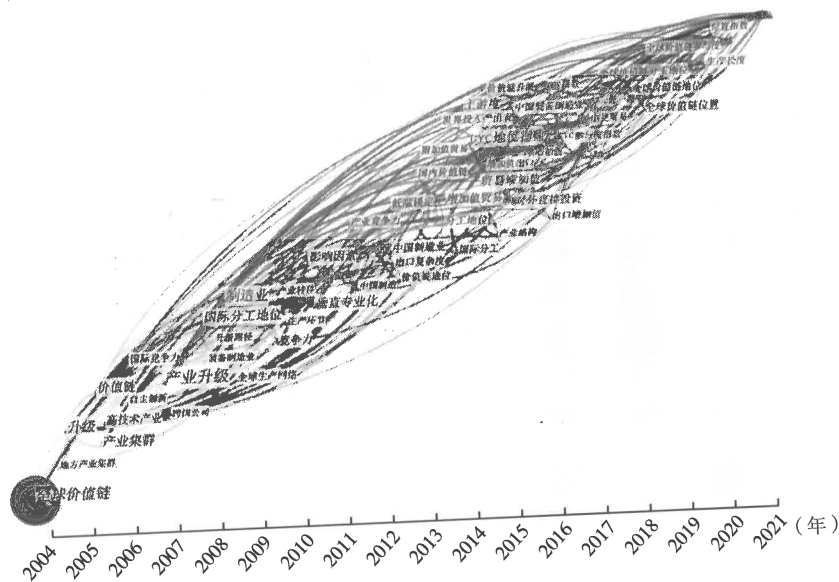


图1 中文文献关键词共现

资料来源:笔者绘制。

① 频次指关键词在数据集中出现的总次数;中心度衡量该关键词在文章数据集的连接作用,表征节点在该研究领域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中心度大的关键词一般属于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的研究方向、内容和方法,可以认为是未来研究前沿热点。本节参考张睿和王义保(2020)的界定方法,以频次高且中心度大于0.1的关键词作为关键节点,反映学者重点关注的议题、话题、方法与领域等。

表 1 中文文献关键词频次和中心度 (TOP 15)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中心度	是否关键节点
1	全球价值链	512	0.23	是
2	制造业	66	0.30	是
3	增加值贸易	41	0.07	否
4	全球价值链地位	33	0.04	否
5	国际分工地位	27	0.11	是
6	产业升级	25	0.30	是
7	贸易增加值	23	0.11	是
8	“一带一路”	23	0.12	是
9	世界投入产出表	21	0.10	否
10	服务业	19	0.01	否
11	分工地位	18	0.07	否
12	垂直专业化	15	0.17	是
13	全球价值链位置	12	0.12	是
14	升级	12	0.31	是
15	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	11	0.18	是

资料来源：笔者计算。

外文研究方面，其研究发展相对成熟，关注的研究领域更为多元且细致，如图 2 所示。早期研究热点聚焦于产业和企业层面，关注企业绩效、创新、产业集群等议题，以及发展中国家等主体。随着全球价值链发展深化，学者逐渐关注全球生产网络、全球供应链的发展态势，亦侧重于亚洲、中国、新兴经济体和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参与主体，同时聚焦于产品开发、创新系统、信息技术以及知识转移等影响全球价值链位势的重要因素。近年则关注垂直专业化、不平等以及碎片化等全球价值链发展特征，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第四次工业革命、数字化和贸易自由化等时代背景。此外，外文研究中共有全球价值链、创新、贸易、全球化、中国、供应链、知识、发展和产业九个关键节点，如表 2 所示。整体而言，外文研究除了关注全球价值链参与主体和位势影响因素外，同样关注全球价值链治理和企业社会责任议题，并且着重于全球价值链嵌入主体权力变动的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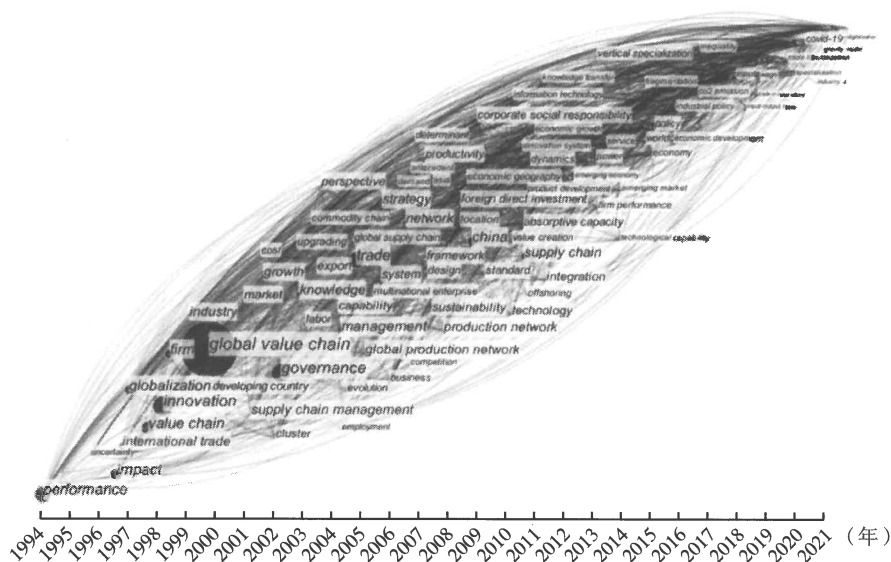


图2 英文文献关键词共现

资料来源：笔者绘制。

表2 外文文献关键词频次和中心度（TOP 15）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中心度	是否关键节点
1	global value chain	621	0.26	是
2	innovation	268	0.12	是
3	governance	257	0.10	否
4	performance	244	0.08	否
5	trade	229	0.18	是
6	globalization	211	0.32	是
7	firm	192	0.08	否
8	management	181	0.07	否
9	China	179	0.13	是
10	supply chain	169	0.20	是
11	network	155	0.05	否
12	knowledge	134	0.11	是
13	growth	130	0.15	是
14	industry	128	0.13	是
15	capability	116	0.06	否

资料来源：笔者计算。

(二) 作者共现分析

通过分析全球价值链位势研究领域的核心作者和作者合作网络,可以直观地了解相关研究“生产力”来源,进而辨别不同研究个体的核心议题和贡献。本节基于吴隽和徐迪(2020)的研究,以文献计量学中的普莱斯定律确定全球价值链位势研究的核心作者^①。

中文研究方面,作者间初步形成以戴翔、倪红福、刘斌等核心作者为中心的若干个小型合作网络,整体合作态势较为紧密,如图3和表3所示。发文量第一的作者是戴翔,其主要研究人才、资本、产业集聚、本土市场规模以及营商环境等各种要素对全球价值链位势攀升的影响,指出地区专业化程度、营商环境、本土市场规模、制造业服务化等对全球价值链位势攀升存在正向影响(戴翔等,2017;戴翔等,2018;戴翔和刘梦,2018;戴翔等,2019;戴翔,2020;戴翔和宋婕,2020)。排名第二的是尹伟华,其则是以产业为切入点研究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位势,认为中国产业均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位置,但呈现攀升的地位演变特征(尹伟华,2015,2016,2017,2018)。在其余的核心作者中,倪红福较为关注总结归纳和改善全球价值链位置测度方法(倪红福,2019),提出增加值平均传递步长方法,(倪红福,2016)。闫云凤倾向于研究中国与美国、日本和韩国等发达国家的全球价值链位势对比,从而寻求中国破除全球价值链低端位势困境的路径(闫云凤,2015,2018)。部分学者研究技术、投资和金融等传统经济要素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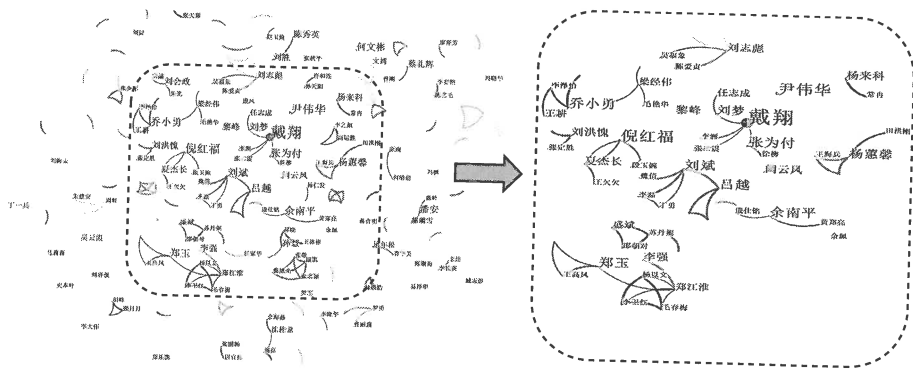


表 3 中文研究核心作者统计

序号	核心作者	频次	序号	核心作者	频次
1	戴翔	19	5	杨蕙馨、郑玉	7
2	尹伟华	10	6	黎峰、刘斌、余南平等 7 人	6
3	倪红福、闫云凤	9	7	夏杰长、杨来科等 5 人	5
4	盛斌、吕越	8	8	刘志彪、张二震、郑乐凯等 22 人	4

资料来源：笔者整理。

全球价值链地位的相互关系（罗伟和吕越，2019；盛斌和景光正，2019；杨蕙馨和田洪刚，2020），也有学者探究知识产权保护、人工智能、数字经济以及碳排放等与全球价值链位势的关系（王向进等，2017；屠年松和曹宇芙，2019；刘斌和潘彤，2020；徐金海和夏杰长，2020）。

外文研究方面，学者合作网络在较多的小范围内交织，部分核心作者为全球价值链位势测算研究作出了奠基性贡献，如图 4 和表 4 所示。在发文量排名方面，庞特（Ponte）和王（Wang）发文量位居外文研究首位（8 篇），蒙（Meng）和库普曼（Koopman）发文量则是 7 篇，并列第二，研究成果在该领域中影响力较强。其中庞特关注发展中国家全球价值链位势升级的主题，分别探究农业、制造业等行业的升级轨迹（Ponte，2009；Rehnberg and Ponte，2018），并指出各参与主体在注重全球价值链位势攀升的同时，需要制定可持续发展战略（Riisgaard et al.，2010；Ponte et al.，2014；Ponte，2020）。王和库普曼在全球价值链位势测算领域的贡献和影响力较大，作者间合作较为紧密，均是推动该领域发展的重要核心作者，其基于投入产出模型分别构建了 KWW 模型和 WWZ 模型，为全球价值链位势提供了较为成熟的测算框架，并完善更新全球价值链位势衡量的方法，有助于学者较好地刻画国家或地区全球价值链位势的发展趋势（Koopman et al.，2010；Koopman et al.，20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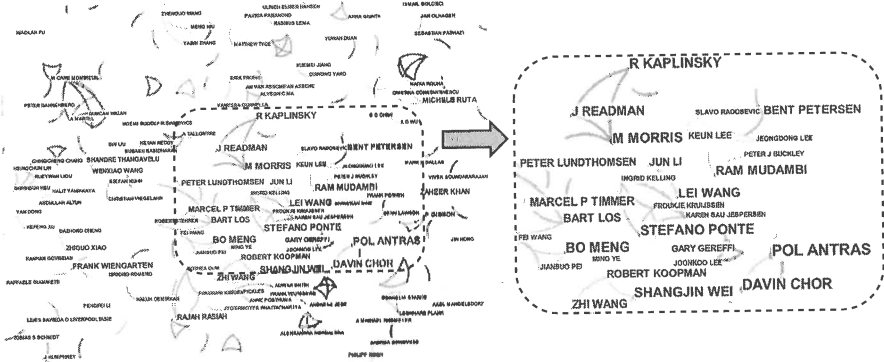


图 4 外文研究核心作者

资料来源：笔者绘制。

2014; Wang et al., 2013; Wang et al., 2017)。而部分核心作者在全球价值链位势领域上作出了不同的尝试和贡献(例如, Johnson and Noguera, 2012; Antràs et al., 2012; Antràs and Chor, 2013; Timmer et al., 2014; Los et al., 2015), 其尽管发文量较少但仍然是学界重要的奠基作者。整体而言, 外文研究作者阐述和完善全球价值链位势的相关概念和测度方法, 不断更新迭代度量微观和宏观层面的全球价值链位势测算方法, 逐步形成较为科学、系统和完整的全球价值链位势研究框架。

表 4

外文研究核心作者统计

序号	核心作者	频次	序号	核心作者	频次
1	庞特 (Ponte)、王 (Wang)	8	4	格里芬 (Gereffi)、洛斯 (Los)、穆坎比 (Mudambi) 等 8 人	5
2	蒙 (Meng)、库普曼 (Koopman)	7	5	蒂默 (Timmer)、楚 (Chor)、莫里斯 (Morris) 等 28 人	4
3	安特拉斯 (Antràs)、李 (Lee)、魏 (Wei) 等 5 人	6	6	约翰逊 (Johnson)、德弗里斯 (de Vries)、朱 (Zhu) 等 46 人	3

资料来源: 笔者整理。

(三) 高被引文献分析

本节将数据库中被引频次较高的文章视为高被引文献, 文献被引频次侧面反映了文章研究质量和深度、在该研究领域的作用、价值和受关注认可程度, 反映出研究领域中的前沿、热点文献以及关键节点^①。

中文研究方面, 被引量排名前十的文章如表 5 所示, 排名第一的文献被引量为 758 (王直等, 2015), 该文诠释王等 (2013) 总贸易流分解框架的基本原理, 系统定义和度量了官方统计贸易数据的增加值和重复计算部分, 并基于三国模型提出一国出口的 16 项指标分解方法, 较为全面地揭示了隐藏在统计数据背后关于跨国生产分工结构的有效信息, 为全球价值链位势研究者提供工具和数据源。被引量第二的中文研究被引频次为 606 (邱斌等, 2012), 文章认为全球价值链地位反映在生产 and 出口产品的技术复杂度水平, 指出融入全球生产网络有利于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提升, 其中资本密集度和高技术资本密集度起积极促进作用, 但经济自由度、研发作用并不显著。排名第三的是 (刘斌等, 2016) 关于制造业服务化和企业全球价值链位势关系的文章, 该文指出制造业服务化显著提升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体系的分工地位, 其中运输、金融和分销服务化的促进作用较为明显。

^① 本节以中外文研究分别在 CNKI 和 Web of Science 的被引频次数据确定高被引文献。

其余高被引文献中,有文章较早地以案例研究方法剖析意大利、西班牙和中国的产业集群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发展模式,探讨中国本土陶瓷产业集群地位跃升面临的挑战和发展思路(文嫣和曾刚,2004)。而大部分高被引文献探讨中国产业(尤其是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嵌入位置、位势影响因素以及升级战略(陈爱贞和刘志彪,2011;樊茂清和黄薇,2014;王岚,2014;周升起等,2014;王岚和李宏艳,2015;林桂军和何武,2015)。总体而言,中国学者基本着重辨析中国产业和企业陷入全球价值链低端位势的现状、困境和升级战略路径,侧重于研判中国产业、企业如何往全球价值链更高层阶跃升。

表5 中文高被引文献(TOP 10)

序号	标题	作者	期刊	频次
1	总贸易核算法:官方贸易统计与全球价值链的度量	王直等(2015)	《中国社会科学》	758
2	参与全球生产网络对我国制造业价值链提升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出口复杂度的分析	邱斌等(2012)	《中国工业经济》	606
3	制造业服务化与价值链升级	刘斌等(2016)	《经济研究》	527
4	融入全球价值链对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	王岚(2014)	《统计研究》	459
5	中国制造业融入全球价值链路径研究——嵌入位置和增值能力的视角	王岚和李宏艳(2015)	《中国工业经济》	442
6	基于全球价值链分解的中国贸易产业结构演进研究	樊茂清和黄薇(2014)	《世界经济》	426
7	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国际分工地位再考察——基于Koopman等的“GVC地位指数”	周升起等(2014)	《国际贸易问题》	420
8	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地方产业集群发展——地方建筑陶瓷产业集群研究	文嫣和曾刚(2004)	《中国工业经济》	288
9	决定我国装备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因素——基于各细分行业投入产出实证分析	陈爱贞和刘志彪(2011)	《国际贸易问题》	233
10	中国装备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及升级趋势	林桂军和何武(2015)	《国际贸易问题》	214

资料来源:笔者整理。

外文研究方面,高被引文献基本上为全球价值链位势测算奠定了坚实基础,如表6所示。被引量居于首位的文献被引频次为859(Timmer et al., 2015),主要内容为WIOD数据库的使用指南,介绍了该数据库的基本构念、

构造方法以及数据源,指出剖析了数据库的局限性和进一步改进领域,为学界利用该数据库测算全球价值链位势提供了指导。排名第二的文献被引量为538 (Johnson and Noguera, 2012),该文基于投入产出表和双边贸易数据计算双边贸易的增加值,指出不同国家和产业的增加值与总出口的比例存在很大差异,是关于全球价值链位势测算的有益的尝试。被引量排名第三的是库普曼等 (2014),该文属于全球价值链位势测算的奠基文章之一,简称为 KWW,其使用总出口增加值分解方法,将约翰逊和诺格拉 (Johnson and Noguera, 2012) 等作者提出的测度方法统一在逻辑框架下,但其中的出口九项分解公式仅局限于国家层面,并未深入部门层面。总体而言,外文高被引前三的文献基本关于全球价值链位势测算方法和数据库构建议题,为全球价值链位势研究奠定了一定的测算基础。

其余高被引文献中,部分作者基于案例和数据剖析全球价值链位势,例如关于制造业、印度汽车产业、南非葡萄酒产业以及拉丁美洲产业集群的全球价值链位势分析 (Giuliani et al., 2005; Ponte and Ewert, 2009; Kumaraswamy et al., 2012; Timmer et al., 2014)。部分作者则对全球价值链位势测算提供了实证模型和计量方法 (Antràs et al., 2012; Antràs and Chor, 2013)。整体而言,外文高被引文献为学界辨析全球价值链位势提供了研究思路 and 手段,大部分是全球价值链位势研究的奠基文章。

表 6 外文高被引文献 (TOP 10)

序号	标题	作者	期刊	频次
1	An Illustrated User Guide to the World Input-Output Database: The Case of Global Automotive Production	蒂默等 (Timmer et al., 2015)	<i>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i>	859
2	Accounting for Intermediates: Production Sharing and Trade in Value Added	约翰逊和诺格拉 (Johnson and Noguera, 2012)	<i>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i>	538
3	Tracing Value-Added and Double Counting in Gross Exports	库普曼等 (Koopman et al., 2014)	<i>American Economic Review</i>	506
4	Upgrading in Global Value Chains: Lessons from Latin American Clusters	朱利亚尼等 (Giuliani et al., 2005)	<i>World Development</i>	498
5	Slicing Up Global Value Chains	蒂默等 (Timmer et al., 2014)	<i>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i>	301
6	Catch-Up Strategies in the Indian Auto Components Industry: Domestic Firms' Responses to Market Liberalization	库马拉斯瓦米等 (Kumaraswamy et al., 2012)	<i>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i>	227

续表

序号	标题	作者	期刊	频次
7	Measuring the Upstreamness of Production and Trade Flows	安特拉斯等 (Antràs et al. , 2012)	<i>American Economic Review</i>	212
8	Organizing the Global Value Chain	安特拉斯和楚 (Antràs and Chor, 2013)	<i>Econometrica</i>	201
9	Estimating Domestic Content in Exports When Processing Trade is Pervasive	库普曼等 (Koopman et al. , 2012)	<i>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i>	195
10	Which Way is “Up” in Upgrading? Trajectories of Change in the Value Chain for South African Wine	庞特和埃沃特 (Ponte and Ewert, 2009)	<i>World Development</i>	186

资料来源：笔者整理。

三、全球价值链位势测算方法

为了更深入地把握全球价值链位势研究相关核算方法的研究脉络，本节梳理概括了全球价值链位势领域的主流核算方法。本节将全球价值链位势的测算框架总结为“两个分解模型，三种主流核算方法”。“两个分解模型”指总出口分解模型（Koopman et al. , 2010；Wang et al. , 2013）和生产分解模型（Wang et al. , 2017）；“三种主流核算方法”为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Koopman et al. , 2010）、上游度指数（Fally, 2012）和全球价值链位置指数（Wang et al. , 2017）。

（一）分解模型

1. 总出口分解模型

基于应用增加值向量和增加值矩阵对出口增加值进行分解的理论基础，库普曼等（2010）从前向联系的视角构建了总出口分解模型（简称“KPWW”），首先将一国的总出口分解为以最终品出口的国内增加值、以中间投入品出口的用于直接进口国生产其国所需产品的国内增加值、以中间投入品出口的用于再出口至第三国产品生产的国内增加值、以中间投入品出口的用于进口返回来源国产品生产的国内增加值和出口的国外增加值五部分。此后，库普曼等（2014）对总出口分解模型进行了完善，并根据出口品最终价值的去向把出口进一步细分为九个部分（简称“KWW”）。KWW 分解模型弥补了垂直专业化和增加值贸易相关研究的不足，为全球价值链位势核算奠定了较为成熟的理论框架，

但是该模型局限于国家层面，尚未细化到产业部门。因此，王等（2013）从后向联系角度将 KWW 拓展至产业部门层面和双边层面（简称“WWZ”），并在库普曼等（2014）基础上把总出口分解拓展为双边分部门出口的分解模型，从而形成了更加全面、精确的 16 项部门层次的总出口分解模型（图 5），WWZ 利用全球投入产出模型的核算方法及分解方式基本上达到完善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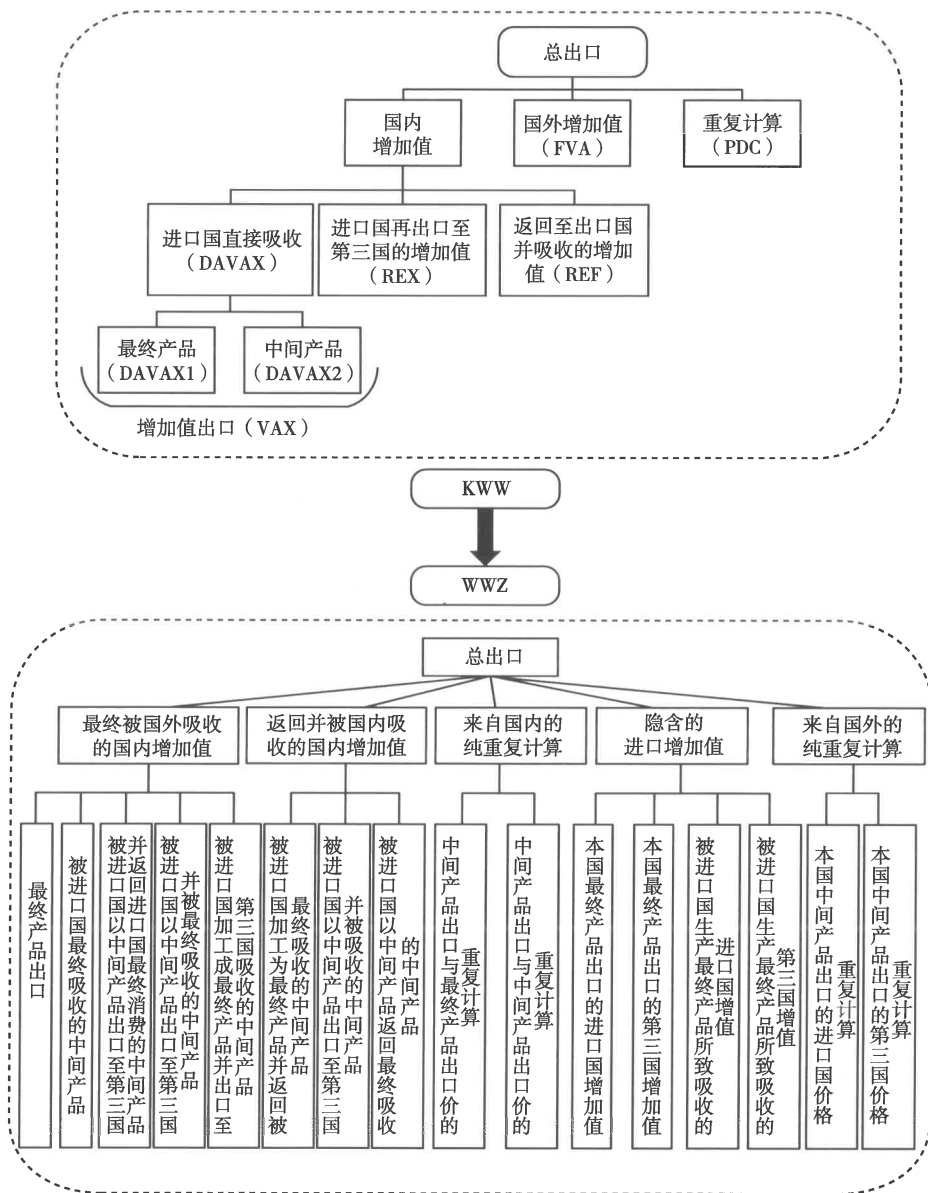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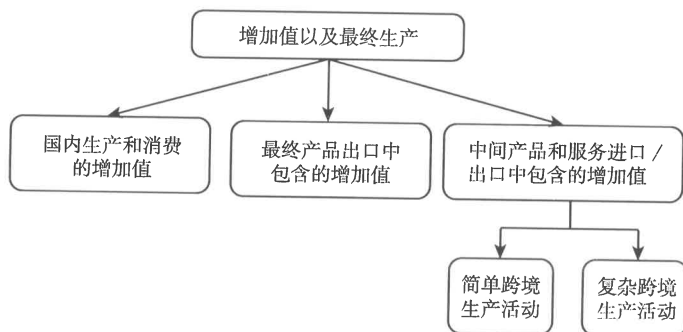


图 5 KWW 和 WWZ 基本框架

资料来源：笔者绘制。

2. 生产分解模型

国际经济活动的运行由国内价值链和国外价值链两部分组成，涵盖了国民经济和对外贸易等经济活动。然而，无论是 KWW 模型还是 WWZ 模型，总出口分解模型都只能从前向联系或后向联系孤立地分析最终出口去向，忽视了国内需求环节而专注于研究出口贸易环节。基于此，王等（2017）以整个国民经济生产活动为基本立足点，构建了生产分解模型的核算框架，将增加值以及最终产品和服务生产分解为三部分：国内生产和消费的增加值、最终产品出口中包含的增加值、中间产品和服务进口/出口中包含的增加值（又可细分为简单跨境生产活动和复杂跨境生产活动），如图 6 所示。生产分解模型的构建不仅将全球价值链位势核算从出口阶段延伸到生产阶段，而且能够从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两个视角综合审视一国的全球价值链位势。



资料来源：笔者绘制。

（二）核算方法

1. 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

基于出口增加值分解模型框架，库普曼等（2010）首次提出全球价值链位势核算的概念和测度方法，构建了“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认为一国出口的间接国内增加值率高于国外增加值率时，则属于全球价值链相对上游位势，反之则是相对下游位势。因其应用方便、界定较为清晰，能从贸易附加值出发，动态地联系国内外增加值以及出口总值，进而科学地反映一国的国际分工水平，故其在全球价值链位势核算领域应用广泛。

2. 全球价值链位置指数

鉴于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不能直观显示一国及其部门所处全球价值链的

位置,仅关注出口贸易环节而忽视国内需求环节,且只能反映其距离上下游的程度。王等(2017)基于增加值提出“全球价值链位置指数”,重新定义了国家一部门层面的全球价值链位置,将分析框架向上延伸至生产阶段,修正了此前分解模型以及当前全球价值链位势测算指标的缺陷,更完整、准确地描绘国家和部门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尽管全球价值链位置指数改进了此前的测算缺陷,但其测算难度相应提升,再加上早期学界使用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习惯,导致测算可靠性较低的地位指数核算方法应用甚广,一定程度上存在盲目使用的现象。总的来说,由于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和位置指数采用的核算方法一定程度上是基于增加值的间接测度方法,但基于投入产出模型核算的位势与国际经济现实的全球生产链顺序(上下游)并不存在完全对应关系,两者仅在相对次序上存在一定程度弱相关,即基于投入产出表的核算难以追溯全球生产链的真实顺序。在存在循环的情况下,不同的生产网络实际上可以构成相同的投入产出表,因此使用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和位置指数核算全球价值链位势时难免造成估算偏误,未能直接反映出位势。

3. 上游度指数

上游度指数同样是广泛推广应用到全球价值链位势核算中的重要测度指标(Ju and Yu, 2015; Antràs and Chor, 2018)。法利(Fally, 2012)和安特拉斯等(2012)分别从生产阶段数和产品部门到最终消费部门的距离角度定义了上游度。此后部分学者尝试改进该方法,力图准确测度全球价值链位势及其演进趋势。王岚和李宏艳(2015)在安特拉斯和楚(2013)的基础上,通过引入直接增加值系数,改进了上游度指数假设各生产阶段之间距离为“1”的条件,克服了上游度指数仅测度部分行业与最终需求的“空间距离”的不足,指出中国需要提升全球价值链参与位势从而推动制造业往高增值环节攀升。米勒和特穆肖夫(Miller and Temurshoev, 2017)将产出上游度指数拓展到了全球多国投入产出核算框架,从平均传递步长视角推导出了上游度和下游度,从投入角度提出了新的下游度测度方法,并验证了上游度和下游度与法利(2012)的测算方法在数学上等价。但是在反馈循环情况下,上游度和下游度的测算存在“全球价值链位置测度悖论”:即离最终需求较远的国家或部门(上游度大),通常离初始要素投入端也相对较远(下游度大)。

四、全球价值链位势的格局演变、影响因素和跃升战略

国际环境复杂多变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进入系统性调整、变革、重构期,反全球化浪潮愈演愈烈,地缘政治促使全球价值链重新布局,国家和地区通过全球生产网络配置生产资源带来经济收益的同时,揭露出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在疫情、战争等突发事件下的高度脆弱性,

全球价值链及其节点面临各国的“入围”和“入围”的动态竞争。各国在全球价值链的位势格局出现变迁变动，全球价值链位势的国家格局结构特点开始转变。其中各种外部环境条件和国家内在要素禀赋影响要素纵横交错，全球价值链作为经济全球化关键的产业组织载体，全球价值链位势“高中低端分流”特征日益明显，各国在多重因素影响下，为占据全球价值链高端位势，提升国家竞争力和国际话语权，其全球价值链位势跃升战略也随着这种发展阶段变化而发生适宜性拓展和转变。

（一）全球价值链位势的国家格局演变

长期以来，由于原材料、技术、劳动和资本等发展要素比较优势的分工与组合，全球价值链分工关系与位势格局主要体现为发达国家占据主导、发展中国家被支配。但目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面临多重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尤其是新冠疫情全球蔓延和病毒加速变异以来，全球价值链发生局部断裂，以人工智能、云计算、5G 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正重塑全球价值链比较优势，引发其国家位势格局演变，对全球经济体系带来深刻影响。国家在全球价值链的位势变动，意味着在全球范围内各国经济利益以及价值在全球价值链每个环节或节点上重新分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低端和高端间移动发生的位势和角色改变。

1. 发达国家

大部分学者指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其产业体系更为先进（Thakur-Weigold, 2021），具备更多生产增加值率高的产业，因此发达国家长期占据全球价值链高端位势，当前仍然处于主导支配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占优位置（Lampon et al., 2018）。一方面，学者认为主要是由发达国家推动和主导全球价值链分工快速演进（凌永辉和刘志彪，2020；吕越等，2020），其按照资本逻辑主导国际分工，在全球价值链位势格局中具备绝对优势。大部分发达国家处于全球价值链的设计研发、品牌销售等两端环节，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优势较为明显（闫云凤，2015；刘磊和关权，2019）。发达国家产业转移效应明显，借助高端产业回流、中低端产业外迁模式持续占据全球价值链领先占优位置（闫云凤，2018）。另一方面，部分学者指出尽管随着新兴经济体崛起，发达国家仍然致力于维护对自身利好的全球价值链格局，希望继续主导国际分工体系，极力抑制其他发展中国家崛起（吕越等，2018；高运胜和杨阳，2020），从而长期占据全球价值链位势制高点（Landesmann and Stoellinger, 2019）。为保证全球价值链分工秩序能够继续服务于自身的国家利益，发达国家将依托盟友筑牢“精英俱乐部”阵线，逆全球化思潮和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Tam, 2020），在长期内维持遏止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发展的策略，对全球价值链产生严重冲击、破坏和割裂效应（高运胜和杨阳，

2020)。部分发达国家推行再工业化以摆脱自身经济发展困境,例如美国的重振制造业计划、日本“供应链改革”等一系列政策举措(刘志彪和吴福象,2018),并且对发展中国家实施技术打压,阻碍发展中国家高技术产业快速发展,从而保持自身在全球价值链的优势主导支配位置。

2. 发展中国家

全球价值链分工为具备基本条件且采取开放发展战略的发展中国家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李晓华,2015),也导致发展中国家产业生存和在全球价值链的发展空间遭遇多重挤压。一方面,部分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家借助自身的劳动力成本和基础设施建设优势,通过对国际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的引进、学习和模仿(Rasiah and Myint, 2013; 刘敏等,2018),日渐融入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全球价值链位势呈上升态势(盛斌等,2020)。有学者以服务业为研究主体,指出中国服务业全球价值链位势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即整体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下游位置,但其位势正不断攀升(乔小勇等,2017; 尹伟华,2017; Chen et al., 2019)。张会清和翟孝强(2018)利用生产分解模型,从前向和后向联系综合考察中国全球价值链位势的特征,认为2000~2014年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势演变呈“V”型轨迹,近年制造业以及相关服务业接近中上游位置,往高位势攀升。另一方面,部分学者强调发展中国家遭受“锁定”和“俘获”,陷于全球价值链低附加值环节、低端位势。发展中国家以“低端嵌入”的方式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Antimiani and Cernat, 2021),随着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不断上升,低成本竞争优势逐渐丧失,由于发展中国家自主研发能力较为薄弱,暂未掌握关键零部件的生产技术,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仅参与全球价值链加工组装环节,面临着“低端锁定”的风险和困境,全球价值链分工演进中“机会不均等”和“地位不平等”的矛盾突出(戴翔,2020)。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技术创新水平、禀赋资源利用能力、产业布局结构以及国际竞争力等方面差距明显,在融入全球价值链过程中有可能陷于新兴产业受制于关键技术的“结构性陷阱”阶段。王岚(2014)基于总出口分解模型构建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认为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国际分工地位呈“V”型发展轨迹,中高技术制造业的位势“锁定”特征较为明显。刘琳(2015)测算中国整体及低中高技术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位势,认为中国目前暂时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位势,中、高技术制造业地位在波动中下降。但王和魏(Wang and Wei, 2018)指出中国制造业没有陷入“低端锁定”,实际上面临的风险是中国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低附加值行业失去成本优势后形成的挤出效应。

(二) 全球价值链位势变动的影响因素

世界各国都企图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合作与竞争体系中占领高端位势，从而提高在全球分工体系的地位、获利能力和竞争优势。全球价值链位势变动是指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低端和高端位势变动的过程；是指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变动的过程；也是指产品低附加值和高附加值变动的过程。本节将全球价值链位势变动的影响因素分为要素禀赋因素和发展环境因素，其中要素禀赋因素包括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外商直接投资和技术创新，发展环境因素包括营商环境、对外开放程度和国内生产配套水平。

1. 要素禀赋因素

要素禀赋是影响全球价值链位势变动的基础和根本（胡昭玲和宋佳，2013），由于世界各国和地区的要素禀赋结构不同，因此各国参与国际分工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全球价值链某一特定环节上的优势（Obashi and Kimura, 2021）。而由于各国在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升级、要素禀赋结构变化，出口产品附加值继而发生变动（林毅夫，2017），因此国家和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位势将会受到影响。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要素禀赋优势是决定分工和专业化的比较优势所在，国际分工体系实际上是各国或地区以优势要素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方勇等，2012；韩永辉等，2021）。国家或地区要素禀赋资源的质量、数量和层次等，是全球价值链分工位势的关键影响因素（戴翔和刘梦，2018）。

（1）自然资源。一国的土地、水、矿产、海洋和能源等自然资源对一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有着重要影响（周升起等，2014；Connor, 2016；刘瑶和程聪，2019）。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下，一国自然资源禀赋影响其国内生产和经济发展，相同产品不同生产制造环节对自然资源禀赋要求并不相同，因此位于不同环节的企业其获取的附加值以及在全球价值链的位势也存在较大差异（刘瑶和程聪，2019）。随着全球价值链分工深化，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以丰富的自然资源参与全球价值链，并实现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李建军和孙慧，2017）。黄灿和林桂军（2017）认为自然资源充裕度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呈正向关系，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向其他国家和地区出口自然资源密集型中间投入，全球价值链位势排名前10位的发展中国家基本上是自然资源充裕的国家。进一步地，国家是否初级资源出口国也会影响全球价值链分工位势，因为资源出口型国家可以利用本国石油、矿石等自然资源禀赋优势从而出口资源密集型商品（刘海云和毛海鸥，2015）。但自然资源呈现有限性和稀缺性等特征，国家依赖自身丰富的自然资源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同时，实际上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经济持续发展以及

全球价值链位势升级 (Gavin, 2015; Zutshi et al., 2016)。

(2) 人力资源。人力资源禀赋是影响技术进步、产业升级的关键因素 (魏龙和王磊, 2017; Indrawati and Kuncor, 2021), 由于各国或地区的劳动力尤其是高技能劳动力规模存在差异, 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获得的经济增长效应和位势攀升效应也会存在显著差异。一方面, 部分学者指出当前产品生产渐趋复杂化、技术日益升级, 国家人力资源越丰富和优势越明显, 其技术吸收速度和效率则越快, 所生产的产品则具有更高技术含量, 全球价值链位势也就较高 (胡昭玲和宋佳, 2013; Chen and Shen, 2021)。魏龙和王磊 (2017) 指出高技术人才等高级生产要素对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位势升级的促进作用强于廉价劳动力等传统生产要素, 与人口红利相比, 增加中、高技术员工比更能提升全球价值链位势。在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的过程中, 随着中国制造业高技能劳动力不断增长, 中间产品创新对全球价值链攀升的正向影响增强 (郑江淮和郑玉, 2020)。另一方面, 有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家依托低成本劳动力优势的支撑从而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有可能难以摆脱“低端嵌入”。例如, 低技术劳动力仍然是中国制造业的主体, 但目前在部分生产制造环节, 中国低技术劳动力成本优势不再 (Fan, 2014), 而中高端人才规模和质量有待提升, 未能解决中国“低端锁定”和“挤出效应”困境 (王磊和魏龙, 2017; 郑江淮和郑玉, 2020)。

(3) 外商直接投资 (FDI)。FDI 流入对企业在全球价值链、全球生产链位置可能存在两个相反方向的影响。一方面, 部分学者指出 FDI 流入可以显著提升全球价值链分工位势 (王玉燕等, 2014; 黄灿和林桂军, 2017; Pavlinek, 2018)。FDI 流入在显著影响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的同时, 也将通过技术进步、加深全球价值链嵌入度等提升产业的全球价值链位势 (唐宜红和张鹏杨, 2017)。FDI 流入可以产生技术溢出效应和学习效应, 跨国公司领先的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等溢出到东道国企业 (Pavlinek and Zizalova, 2016), 促进本土企业技术水平提高, 优化生产结构并提升产品品质。推动上下游配套产业协同互动发展以及产业功能升级, 从而促进企业实现全球价值链位势提升 (胡昭玲和宋佳, 2013)。马诺瓦等 (Manova et al., 2015) 指出 FDI 流入可以缓解生产链上游如研发、设计等高附加值、资本密集型环节的融资约束。此外, FDI 将产生竞争效应, 即加剧东道国国内市场的竞争程度, 倒逼企业加速更新升级生产技术和设备, 进一步促进企业整体技术水平和产品品质的提升, 最终提高全球价值链位势 (杨仁发和李娜娜, 2018)。另一方面, 部分学者认为 FDI 流入未能提升全球价值链位势、甚至是抑制了全球价值链位势的攀升 (陈爱贞和刘志彪, 2011; 杨高举和黄先海, 2013; 马野青等, 2017)。出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优势, 外商投资企业放置大量加工组装环节在中国等国家, 从而导致其嵌入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 (王玉燕等, 2014)。外商投资企业发展造成中国装备制造业产业关联的“外泄”, 中国此

前“为出口而进口”的贸易模式是抑制装备制造业的自主创新动力和发展规模的重要因素,大部分企业集中于单一环节,导致中国装备制造业难以实现投入要素高级化发展以及垂直分工深化(陈爱贞和刘志彪,2011)。马野青等(2017)指出 FDI 流入产生的“低端锁定”效应有可能超过技术溢出效应,FDI 流入与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全球价值链位势呈负向影响关系,其中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负向影响更明显。

(4) 技术创新。大部分学者认为研发投入、技术创新与全球价值链位势存在显著正相关,抢占全球价值链高端位势例如研发设计环节需要大量的专利、技术储备,通过加大研发投入能够有效促进全球价值链位势攀升(胡昭玲和宋佳,2013;杨高举和黄先海,2013;Bi et al., 2016;魏龙和王磊,2017;高敬峰和王彬,2020)。从装备制造业发展历程来看,发达国家占据全球价值链高端位置的深层原因是其投入的技术和服务要素逐渐高级化,将技术和知识物化到装备制造是技能提升和生产效率提高关键因素,有助于提升附加值和占据全球价值链高端位势(陈爱贞和刘志彪,2011)。因此,研发投入是发展中国家提升创新能力与技术水平的关键影响因素,国家通过增大研发投入提升出口产品的增值能力,从而提升全球价值链位势(Dey et al., 2019)。发展中国家可以借助技术外溢实现技术进步,改善本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所处地位(叶红雨和杨清,2013;杨高举和黄先海,2013;王孝松等,2015)。但是如果学习和吸收能力有限,容易过度依赖进口技术,陷入“技术引进”陷阱,本土企业则难以培育发展自主创新能力,更难以提升全球价值链位势(肖利平和谢丹阳,2016;Barbieri et al., 2020)。

2. 发展环境因素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除传统国际分工条件外,发展环境也是影响一国或地区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位势的关键要素(戴翔和金碚,2014),要素禀赋因素能否真正转化为一国或地区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现实基础和比较优势,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发展环境等影响要素禀赋作用发挥的外在条件。随着经济全球化渐趋深化,全球价值链位势竞争实际上演变为国家间政府、环境等多方面、全方位的竞争。而在发展环境的构成要素中,营商环境、对外开放水平以及国内生产配套水平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和内容。

(1) 营商环境。营商环境作为企业生存的制度环境,直接影响着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全过程,政府的资源配置管理能力与效率是国家、产业和企业提升全球价值链位势的重要影响因素(Zhang and Huang, 2012),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对于提升该国制造企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具有重要意义。较好的营商环境表明政府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较强,能够在提高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同时促进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黄琼和李娜娜,2019)。学者普遍认为优化营商环境、提供高质量公共服务,有利于企业以降

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促进技术创新,提升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能力和提高全球价值链位势(何文彬,2019;刘胜和申明浩,2019;康金红和戴翔,2021)。营商环境影响企业的契约执行效率,因而构成影响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重要因素(Acemoglu et al., 2007;李坤望和王永进,2010),国家或地区具备越高的契约执行效率,其企业则更容易参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支配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杨高举和黄先海,2013)。部分学者则以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作为营商环境的表征,指出其对国家或地区全球价值链分工位势具有关键性影响,知识产权保护强度越高,国家或地区的企业更容易融入全球价值链(顾振华和沈瑶,2015;杨珍增和刘晶,2018)。

(2) 对外开放程度。对外开放影响国家或地区企业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嵌入全球价值链以及提升全球价值分工地位过程(戴翔和郑岚,2015;Ju et al., 2020)。一方面,部分学者指出对外开放程度越高,企业越能从全球价值链分工中获取“学习和竞争效应”,进而提升技术水平和效率,实现全球价值链位势攀升(戴翔和郑岚,2015;Beverelli et al., 2017)。何宇等(2020)指出在既有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适当的对外开放程度能够提升国家或地区在全球价值链中分工位势,国家或地区选择最优对外开放程度,通过主动削减国外贸易关税性和制度性成本以实现更大程度的对外开放,以增强中国产业全球竞争力和促进全球价值链位势攀升。张丽等(2021)指出服务业对外开放显著提升了中国制造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并进一步提升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另一方面,部分学者认为对外开放程度扩大有可能对产业往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产生负向影响(綦良群和李兴杰,2011;黄琼和李娜娜,2019)。一国或地区对外开放程度提升,可能引致外资企业利用东道国廉价的生产要素以及自身拥有的成熟技术抢占市场,排挤东道国企业的市场份额(綦良群和李兴杰,2011)。导致东道国本已具有一定创新能力的产业面临高端人才流失和技术主导权失控的困境,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东道国企业的研发活动和创新能力(Xie and Li, 2018),更限制了全球价值链位势攀升。孟雪等(2017)指出中国金融服务开放度过高,超出金融行业对金融风险的承受范围时,反而会降低总体经济和行业利益,抑制行业全球价值链位势攀升。

(3) 国内生产配套水平。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国内生产配套能力与国家、产业和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和竞争力密不可分。大部分学者认为国内生产配套水平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位势呈正相关(Halaszovich and Kinra, 2020)。一国或地区贸易增长动力来源表现为出口产品的内生能力差异,出口导向与进口替代、加工贸易与一般贸易、中间品进口等国内生产配套对出口产品的国内增加值份额产生显著影响,进而影响国际分工地位。国内生产配套水平越高,中间品进口占比越低,该部门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位势则越有利(黎峰,2015)。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中间品贸易及“多国生产”导致了

产品国内附加值较低,一国或地区过于依赖外部供给而忽略内生制造能力及国内生产配套培育是全球价值链位势偏低的主要症结(黎峰,2016)。马野青等(2017)指出国内生产配套能力越强,则能够扩大协同效应,促进各方面基本活动协调发展。例如,基础设施供应能力提升有利于产业深化加工,科研活动则有助于企业顺利开展自主品牌设计(Barbieri et al., 2020)。各辅助活动逐渐发展壮大的同时,各部门专业分工程度加深,进一步提升中国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Meng et al., 2017),而这种正向影响在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中更为显著。余珮和彭歌(2020)认为国内生产配套能力与国家价值链指出全球价值链地位升级呈正相关,扶持国内配套生产有助于提高中间品生产的本地化率,通过内部供给增加产品的国内附加值,进而提升产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

(三) 全球价值链位势的跃升战略

全球价值链位势关系到国家或地区生产成本、获利水平、研发技术、高端要素集聚、国际市场份额以及国际竞争力和话语权等优势。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国家或地区常常会根据其生产水平和比较优势制订不同的全球价值链战略,在全球价值链位势“高中低端分流”特征日益明显的背景下,随着全球价值链发展国家或地区所积累的产业结构、发展模式、路径依赖等问题不断显现,亟需选择最适宜和最有效的全球价值链位势跃升战略路径。

1. 内部提升战略

(1) 禀赋利用战略。国家根据自身要素禀赋结构特征,选择合理的禀赋利用方式战略来提升产业竞争力、发挥企业优势以趋利避害,从而实现全球价值链位势攀升(Sun et al., 2012; 黎峰, 2015; 王玉燕和王婉, 2020; 郝晓等, 2021)。中国实现经济后发追赶和产业升级迭代依赖于要素利用结构优化,劳动力投入是中国制造业实现升级的重要影响因素(苏杭等, 2017),中国企业应该着重推进资本尤其是人力资本积累。部分学者指出人力资本结构升级优化有助于促进国家在全球价值链的位势提升(耿晔强和白力芳, 2019; 齐俊妍和任奕达, 2021; Indrawati and Kuncor, 2021)。国家或地区需要积极调动创新型要素、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以及劳动力等要素禀赋优势,逐步转向资本以及技术密集型发展,将生产能力优势置换成为创新能力优势,从而实现全球价值链位势攀升(Bi et al., 2016; 陈艺毛等, 2019)。

(2) 创新驱动战略。国家或地区通过加大研发投入、提高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强化在全球价值链的话语权和竞争力,从而实现全球价值链位势升级。企业通过运用信息技术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创新产品线建设并减少低附加值生产活动(Kinkel, 2012)。国家需要提升技术知识吸收能力从而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也就是主动选择吸收合适的技术知识,以此形成全球价值

链位势提升的优势 (Hannigan et al., 2015; Lema et al., 2015)。当前全球技术革命发展迅猛,引领性技术和颠覆性技术不断发展,国家需要增强技术创新和关键技术攻克能力,虹吸、集聚、整合和配置全球创新要素,将扩大开放、吸引全球创新要素和自主研发设计结合 (Chandrashekar and Subrahmanya, 2019),奠定坚实的技术基础从而实现全球价值链位势攀升。张其仔和许明 (2020) 强调国家实现高质量发展就需要制定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重点围绕航空航天和生物医药等产业部署创新链,通过实现创新链和产业链的双螺旋跨越,从而更高质量地嵌入全球创新密集型产业,提升全球价值链位势。

(3) 国内价值链构建战略。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双重背景下,全球价值链在各国国内延伸 (Beverelli et al., 2016; Meng et al., 2016),部分学者认为国家应该构建基于本土市场的国内价值链,促进国内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的良性互动,从而实现全球价值链位势攀升 (李跟强和潘文卿, 2016)。后发国家在全球价值链和国内价值链的交互关系中实现产业升级和区域协调创新发展,是解决“增长与升级”两难问题的战略思路 (刘志彪, 2011, 2012)。赵桐和宋之杰 (2018) 指出中国需要有阶段、有重点利用国内价值链优势提升全球价值链位势,重点在于构筑相对独立的国内价值链,将产品组装和加工等相对低附加值的环节向中西部转移,东部则凭借技术优势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并且实现东部带动中西部的创新驱动转型,进一步地依托国内价值链建立时积累的技术优势,摆脱发达国家主导的“俘获”困境,逐渐向全球价值链高端位势攀升。盛斌等 (2020) 强调国家需要充分盘活国内市场,提高国内价值链竞争性与开放度,通过构筑国内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区域分工和全球分工之间稳定良好的对接关系,构建内外联动的新型开放发展格局,从而实现全球价值链位势攀升。

2. 外部优化战略

(1) 对外投资战略。大部分学者指出对外直接投资 (OFDI) 能够促进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和全球价值链增加值增加 (郑丹青, 2019; 余海燕和沈桂龙, 2020; Hanle et al., 2021)。企业可以通过 OFDI、跨国并购大幅提升技术管理创新水平及核心能力,提升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位势 (Yang et al., 2020; 景光正和盛斌, 2021)。杨连星和罗玉辉 (2017) 指出在当前“一带一路”倡议推进过程中,国家应该完善企业“走出去”制度机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需要着重推动技术密集型企业参与对发达国家的 OFDI,借此实现全球价值链位势升级 (韩永辉和罗晓斐, 2017)。余海燕和沈桂龙 (2020) 认为发展中国家的 OFDI 战略存在两面性,OFDI 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不及边际产业转移效应显著,应该发挥中央和国有企业 OFDI 战略对于全球价值链位势攀升的优势,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 OFDI,在更高起点上促进国家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戴翔和宋婕 (2020) 指出中国对东道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将大幅提升中国相对于该东道国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位势。因此国家在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过程中, 需要注重 OFDI 的全球价值链位势攀升效应及其空间外溢, 加快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位势 (Pananond, 2013)。

(2) 制度型开放战略。这是指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需要适应新时代发展形势, 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逐渐转变为规则等制度型开放, 在负面清单管理、营商环境建设等方面实现突破, 从而促进全球价值链的位势攀升 (Chen, 2019; 康金红和戴翔, 2021; 马淑琴等, 2021)。在新一轮全球经济投资规则体系演变新趋势下, 国家需要提升开放发展的水平、层次和质量, 以实现与全球高标准、高水平的规则体系对接和衔接, 由依托降低和削减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边境开放”为主转变为以“境内开放”措施为主, 构筑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和新特点、符合国家提升全球价值链位势的制度型开放战略 (Dovis and Zaki, 2020; 戴翔, 2020)。裴长洪等 (2014) 指出中国需要发挥大国优势, 抓住全球价值链国际分工格局不断变化的机遇, 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同时, 需要依据产业发展和开放的特点, 以负面清单为管理模式、以自由贸易协定为载体, 制定制度型开放战略推动全球价值链位势不断攀升。积极为高技术含量的产业构筑更高标准的产业集聚和城市集聚平台, 充分利用负面清单保护新建企业、培育潜力企业, 促进中国产业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推进。许培源和刘雅芳 (2021) 认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作为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重要成员, 目前仍然处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位势, 因此发展中国家应该积极利用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区域贸易协定, 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 制定制度型开放战略从而减少规则差异导致自身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劣势。

(3) 产业转移战略。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不断细化的背景下, 国家需要有预见性地对产业进行调整, 制定国际产业转移战略 (Li et al., 2021), 将部分生产制造环节、工序和流程转移和拓展到国外, 令自身突破资源要素限制, 实现全球价值链位势攀升 (魏巍等, 2016)。目前国际产业转移并存交错, 发展中国家亟需追求“学习效应”, 制定逆梯度产业转移战略, 在受到国内市场和技术瓶颈挑战时, 将发展初期依赖国内土地、劳动力等资源产业的高端环节转移到相对发达的国家或地区, 通过逆向型的技术投资活动促进产业升级转型, 从而实现全球价值链位势攀升 (彭薇和熊科, 2018)。发展中国家需要利用自身产能优势, 细分北亚、东南亚、独联体、东欧以及中欧等区域市场, 制定差异化且有针对性的产业转移战略, 结合自身技术优势, 实现全球产业链、全球价值链和全球创新链等共生共荣。黄郑亮 (2019) 指出在国际经济格局动荡、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背景下, 越南制造业由于缺乏自主性、创新性, 需要积极承接国际技术转移, 从而寻求产业技术创新点, 走出符合越南国情的全球价值链攀升道路。

五、结论与展望

在全球价值链体系加速变革和重构的背景下,国家、地区和部门在全球价值链所处的位势研究已经成为学界业界和政府都极其关心的议题,深化该领域研究具备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重大价值。本文基于 CNKI 和 Web of Science 的核心文献,结合利用文献计量和内容分析方法,回顾并廓清有关全球价值链位势研究的变迁和演化脉络,提出全球价值链位势研究的逻辑框架,梳理了全球价值链位势的测算技术特征、国家格局演变、具体影响因素和跃升战略设计,以揭示全球价值链位势格局的演变特征、影响要素和升级路径,以及全球价值链位势核算的基础模型和实证应用方法,为未来全球价值链位势的理论研究和现实应用提供支撑。

(一) 研究结论

本文研究发现:(1) 全球价值链位势测算研究框架主要包括重要工具、分解模型以及主流核算方法;重要工具为投入产出模型,两个分解模型包括总出口分解模型和生产分解模型,三种主流核算方法分为全球价值链位置指数、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和上游度指数;(2) 全球价值链位势的国家格局仍然呈现发达国家“主导支配”和发展中国家“低端锁定”两个特征;(3) 影响全球价值链位势变动的因素可以分为要素禀赋因素和发展环境因素,要素禀赋因素包括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外商直接投资和技术创新,发展环境因素包括营商环境、对外开放水平和国内生产配套水平;(4) 全球价值链位势跃升战略可以分为内部提升战略和外部优化战略两大类型,内部提升战略可以分为禀赋利用、创新驱动和国内价值链构建战略;外部优化战略主要涉及对外投资、制度型开放和产业转移战略;(5) 尽管目前全球价值链位势测算框架渐趋成熟,但仍然存在与现实经济冲突、间接核算偏误以及位置测度悖论等缺陷,难以精准核算全球价值链位势。

(二) 研究展望

全球价值链位势研究实际上跨越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等学科,同时也跨越宏观和微观领域,但目前系统性、体系化的理论逻辑框架仍未成型。本文主要通过文献梳理和计量可视化分析对全球价值链位势研究进行研判分析,以促进学界和实践界在此基础上把握全球价值链位势的研究成果和演化脉络,更为深入地研究全球价值链位势国家格局演变、影响因素和跃升战略等议题。整体而言,该领域的研究仍有理论框架构建和测算科学性等方面的不足,因此未来关于全球价值链位势研究可以在以下方面开展进一步的研究。

一是重视理论框架构建。通过深入研判上述研究热点和议题,本文发现尽管大量文献对全球价值链位势不同领域进行详尽研究,但对于全球价值链位势研究理论体系仍较为繁杂,核心概念界定和内涵常有争议,理论机制比较零散,缺乏扎实的理论基础,无法形成统一自洽的理论框架,导致学界和实践界都无法从理论层面理解全球价值链位势的原始决定因素,更无法清楚阐述和廓清全球价值链位势的影响因素。相关学术研究由于受到学科边界局限而难以对世界大变局的现实问题进行全面分析,难以探讨在现实经济意义上的因果关系,理论框架尚未完全切合新形势下全球价值链参与主体的位势跃升策略。因此,未来全球价值链位势研究可以逐步尝试全面、科学、系统地构建全球价值链位势研究理论框架,构建嵌入全球价值链位势发展特点的理论模型,对位势变量进行结构性解释,为各主体参与全球价值链并作出位势调整战略提供科学可靠的理论基础。

二是逐步完善优化核算方法。当前学界大多基于世界投入产出表,利用上游度和全球价值链位置指数等指标测算全球价值链位势,但投入产出表编制时滞性、与现实生产链位置脱节冲突、相关指标计算应用混乱等问题仍然有待解决。目前全球价值链测算多局限于核算框架,与现实生产、外贸活动存在矛盾现象。例如,各种核算方法均认为国家或行业越处于上游环节,其技术水平或增加值就越高,国际竞争力则相对越强。但现实经济中,部分全球价值链上游环节的国家(地区)的产业竞争力并非相当强盛,而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下游位势的国家(地区)(如中国),也有可能凭借相对完整的产业链以及大规模装备制造能力而占据部分产业国际竞争力高地。因此,未来研究可以深入探讨全球价值链位势核算结果与现实国际经济的冲突之处,促进其融合以及保持一致性,将全球价值链位势测算渗透至其余领域,使其更加贴近现实。

参考文献

- [1] 陈爱贞,刘志彪. 决定我国装备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因素——基于各细分行业投入产出实证分析[J]. 国际贸易问题, 2011(4): 115-125.
- [2] 陈艺毛,李春艳,杨文爽. 我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与产业升级分析——基于增加值贸易视角[J]. 经济问题, 2019(5): 105-114.
- [3] 戴翔,李洲,张雨. 服务投入来源差异、制造业服务化与价值链攀升[J]. 财经研究, 2019, 45(5): 30-43.
- [4] 戴翔,刘梦,张为付. 本土市场规模扩张如何引领价值链攀升[J]. 世界经济, 2017, 40(9): 27-50.
- [5] 戴翔,刘梦. 人才何以成为红利——源于价值链攀升的证据[J]. 中国工业经济, 2018(4): 98-116.
- [6] 戴翔,宋婕. 中国 OFDI 的全球价值链构建效应及其空间外溢[J]. 财经研究,

2020, 46 (5): 125-139.

[7] 戴翔, 徐柳, 张为付. 集聚优势与价值链攀升: 阻力还是助力 [J]. 财贸研究, 2018, 29 (11): 1-14.

[8] 戴翔, 郑岚. 制度质量如何影响中国攀升全球价值链 [J]. 国际贸易问题, 2015 (12): 51-63, 132.

[9] 戴翔. 新冠肺炎疫情下全球价值链重构的中国机遇及对策 [J]. 经济纵横, 2020 (6): 71-79, 2.

[10] 戴翔. 营商环境优化能够提升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吗 [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20 (5): 48-61.

[11] 樊茂清, 黄薇. 基于全球价值链分解的中国贸易产业结构演进研究 [J]. 世界经济, 2014, 37 (2): 50-70.

[12] 高敬峰, 王彬. 数字技术提升了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吗 [J]. 国际经贸探索, 2020, 36 (11): 35-51.

[13] 高举, 黄先海. 内部动力与后发分工地位升级 [J]. 中国社会科学, 2013 (2): 25-45.

[14] 高运胜, 杨阳. 全球价值链重构背景下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目标与路径研究 [J]. 经济学家, 2020 (10): 65-74.

[15] 耿晔强, 白力芳. 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研发强度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 [J]. 世界经济研究, 2019 (8): 88-102, 136.

[16] 顾振华, 沈瑶. 知识产权保护、技术创新与技术转移——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视角 [J]. 国际贸易问题, 2015 (3): 86-97, 176.

[17] 韩永辉, 罗晓斐. 中国与中亚区域贸易合作治理研究——兼论“一带一路”倡议下共建自贸区的可行性 [J]. 国际经贸探索, 2017, 33 (2): 72-84.

[18] 韩永辉. 全球价值链衍化与价值链导向的政策选择——兼论两岸产业的应对策略 [J]. 台湾研究, 2017 (3): 61-67.

[19] 韩永辉, 张帆, 李子文. 双向 FDI 与雾霾空气污染: 理论机制与中国经验 [J]. 国际经贸探索, 2021, 37 (7): 100-112.

[20] 郝晓, 王林彬, 孙慧, 赵景瑞. 基础设施如何影响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例 [J]. 国际经贸探索, 2021, 37 (4): 19-33.

[21] 何文彬. “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全球价值链升级驱动因素分析 [J]. 亚太经济, 2019 (3): 13-25, 149.

[22] 何宇, 张建华, 陈珍珍. 贸易冲突与合作: 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解释 [J]. 中国工业经济, 2020 (3): 24-43.

[23] 胡昭玲, 宋佳. 基于出口价格的中国国际分工地位研究 [J]. 国际贸易问题, 2013 (3): 15-25.

[24] 黄灿, 林桂军. 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发展中国家的视角 [J]. 国际商务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2017 (2): 5-15.

[25] 黄琼, 李娜娜. 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比较 [J]. 华东经济管理, 2019, 33 (1): 100-106.

[26] 黄郑亮. 越南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研究 [J]. 东南亚研究, 2019 (5):

86-108, 156.

[27] 景光正, 盛斌. 跨国并购、汇率变动与全球价值链地位 [J]. 国际金融研究, 2021 (3): 37-46.

[28] 康金红, 戴翔. 营商环境优化与全球价值链参与 [J].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2021, 23 (2): 79-91.

[29] 黎峰. 全球价值链下的出口产品结构 with 贸易收益——基于增加值视角 [J]. 世界经济研究, 2016 (3): 86-96, 135-136.

[30] 黎峰. 全球价值链下的国际分工地位: 内涵及影响因素 [J]. 国际经贸探索, 2015, 31 (9): 31-42.

[31] 李建军, 孙慧. 全球价值链分工、制度质量与中国 ODI 的区位选择偏好——基于“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的研究 [J]. 经济问题探索, 2017 (5): 110-122.

[32] 李杰, 陈超美. CiteSpace: 科技文本挖掘及可视化 [M]. 北京: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16.

[33] 李坤望, 王永进. 契约执行效率与地区出口绩效差异——基于行业特征的经验分析 [J]. 经济学 (季刊), 2010, 9 (3): 1007-1028.

[34] 李晓华. 国际产业分工格局与中国分工地位发展趋势 [J]. 国际经贸探索, 2015, 31 (6): 4-17.

[35] 林桂军, 何武. 中国装备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及升级趋势 [J]. 国际贸易问题, 2015 (4): 3-15.

[36] 林毅夫. 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发展方向 [J]. 经济评论, 2017 (3): 4-16.

[37] 凌永辉, 刘志彪. 内需主导型全球价值链的概念、特征与政策启示 [J]. 经济学家, 2020 (6): 26-34.

[38] 刘斌, 魏倩, 吕越, 等. 制造业服务化与价值链升级 [J]. 经济研究, 2016, 51 (3): 151-162.

[39] 刘斌, 潘彤. 人工智能对制造业价值链分工的影响效应研究 [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20, 37 (10): 24-44.

[40] 刘海云, 毛海欧. 国家国际分工地位及其影响因素——基于“GVC 地位指数”的实证分析 [J]. 国际经贸探索, 2015, 31 (8): 44-53.

[41] 刘磊, 关权. 中日韩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比较——基于国内技术含量的视角 [J]. 现代日本经济, 2019 (5): 55-69.

[42] 刘琳. 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测度与分析——基于附加值贸易的考察 [J]. 世界经济研究, 2015 (6): 71-83, 128.

[43] 刘敏, 赵璟, 薛伟贤. “一带一路”产能合作与发展中国家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 [J]. 国际经贸探索, 2018, 34 (8): 49-62.

[44] 刘胜, 申明浩.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与制造业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 [J]. 改革, 2019 (1): 150-158.

[45] 刘志彪, 张杰. 全球代工体系下发展中国家俘获型网络的形成、突破与对策——基于 GVC 与 NVC 的比较视角 [J]. 中国工业经济, 2007 (5): 39-47.

[46] 刘志彪, 吴福象. “一带一路”倡议下全球价值链的双重嵌入 [J]. 中国社会

科学, 2018 (8): 17-32.

[47] 罗伟, 吕越.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影响 [J]. 世界经济, 2019, 42 (5): 49-73.

[48] 吕越, 陈帅, 盛斌. 嵌入全球价值链会导致中国制造的“低端锁定”吗? [J]. 管理世界, 2018, 34 (8): 11-29.

[49] 吕越, 谷玮, 包群. 人工智能与中国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 [J]. 中国工业经济, 2020 (5): 80-98.

[50] 马淑琴, 柴美珍, 赵红英, 刘泽胜. OFDI 绿色技术溢出与全球价值链升级——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例 [J]. 中国流通经济, 2021, 35 (4): 70-81.

[51] 马野青, 张梦, 巫强. 什么决定了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基于贸易增加值的视角 [J]. 南京社会科学, 2017 (3): 28-35.

[52] 倪红福, 夏杰长. 中国区域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作用及其变化 [J]. 财贸经济, 2016 (10): 87-101.

[53] 倪红福. 全球价值链位置测度理论的回顾和展望 [J].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19 (3): 105-117, 160.

[54] 倪红福. 全球价值链中产业“微笑曲线”存在吗? ——基于增加值平均传递步长方法 [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6, 33 (11): 111-126, 161.

[55] 裴长洪, 杨志远, 刘洪愧.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影响的分析 [J]. 财贸经济, 2014 (12): 5-16, 63.

[56] 彭薇, 熊科. 全球价值链嵌入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转移研究——基于世界投入产出模型的测度 [J]. 国际商务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2018 (3): 38-48.

[57] 齐俊妍, 任奕达. 数字经济渗透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基于行业异质性的跨国经验研究 [J]. 国际贸易问题, 2021 (9): 105-121.

[58] 綦良群, 李兴杰. 区域装备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机理及影响因素研究 [J]. 中国软科学, 2011 (5): 138-147.

[59] 乔小勇, 王耕, 郑晨曦. 我国服务业及其细分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研究——基于“地位—参与度—显性比较优势”视角 [J]. 世界经济研究, 2017 (2): 99-113, 137.

[60] 邱斌, 叶龙凤, 孙少勤. 参与全球生产网络对我国制造业价值链提升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出口复杂度的分析 [J]. 中国工业经济, 2012 (1): 57-67.

[61] 邱均平, 王日芬. 文献计量内容分析法 [M].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08.

[62] 盛斌, 景光正. 金融结构、契约环境与全球价值链地位 [J]. 世界经济, 2019, 42 (4): 29-52.

[63] 盛斌, 苏丹妮, 邵朝对. 全球价值链、国内价值链与经济增长: 替代还是互补 [J]. 世界经济, 2020, 43 (4): 3-27.

[64] 苏杭, 郑磊, 牟逸飞. 要素禀赋与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基于 WIOD 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分析 [J]. 管理世界, 2017 (4): 70-79.

[65] 唐宜红, 张鹏杨. FDI、全球价值链嵌入与出口国内附加值 [J]. 统计研究, 2017, 34 (4): 36-49.

- [66] 涂智苹, 宋铁波. 制度理论在经济组织管理研究中的应用综述——基于 Web of Science (1996—2015) 的文献计量 [J]. 经济管理, 2016, 38 (10): 184-199.
- [67] 屠年松, 曹宇芙. 知识产权保护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研究——基于 OECD 国家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J]. 软科学, 2019, 33 (6): 37-41, 48.
- [68] 王岚, 李宏艳. 中国制造业融入全球价值链路径研究——嵌入位置和增值能力的视角 [J]. 中国工业经济, 2015 (2): 76-88.
- [69] 王岚. 融入全球价值链对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 [J]. 统计研究, 2014, 31 (5): 17-23.
- [70] 王磊, 魏龙. “低端锁定”还是“挤出效应”——来自中国制造业 GVCs 就业、工资方面的证据 [J]. 国际贸易问题, 2017 (8): 62-72.
- [71] 王欠欠, 夏杰长. 服务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提升与制造业技术进步 [J]. 世界经济研究, 2019 (5): 67-79, 135.
- [72] 王向进, 杨来科, 钱志权. 出口结构转型、技术复杂度升级与中国制造业碳排放——从嵌入全球价值链的视角 [J]. 产经评论, 2017, 8 (3): 5-17.
- [73] 王孝松, 翟光宇, 林发勤. 中国出口产品技术含量的影响因素探究 [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4 (11): 21-69.
- [74] 王玉燕, 王婉. GVC 嵌入、创新型人力资本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基于“新发展理念”的影响机制分析与效应检验 [J]. 商业研究, 2020 (5): 67-76.
- [75] 王振国, 张亚斌, 单敬, 等. 中国嵌入全球价值链位置及变动研究 [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9, 36 (10): 77-95.
- [76] 王直, 魏尚进, 祝坤福. 总贸易核算法: 官方贸易统计与全球价值链的度量 [J]. 中国社会科学, 2015 (9): 108-127.
- [77] 魏龙, 王磊. 全球价值链体系下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分析 [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7, 34 (6): 71-86.
- [78] 魏巍, 吴明, 吴鹏. 不同发展水平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位置差异分析——基于国际产业转移视角 [J]. 产业经济研究, 2016 (1): 80-91, 99.
- [79] 文婷, 曾刚. 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地方产业集群发展——地方建筑陶瓷产业集群研究 [J]. 中国工业经济, 2004 (6): 36-42.
- [80] 徐金海, 夏杰长. 全球价值链视角的数字贸易发展: 战略定位与中国路径 [J]. 改革, 2020 (5): 58-67.
- [81] 许培源, 刘雅芳. 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研究 [J]. 亚太经济, 2021 (3): 86-95.
- [82] 闫云凤. 全球价值链的嵌入机制与演进路径研究——基于中美生产链长度的比较 [J]. 经济学家, 2018 (2): 93-99.
- [83] 闫云凤. 中日韩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作用——基于贸易增加值的测度与比较 [J]. 世界经济研究, 2015 (1): 74-80, 128.
- [84] 杨高举, 黄先海. 内部动力与后发国分工地位升级——来自中国高技术产业的证据 [J]. 中国社会科学, 2013 (2): 25-45, 204.
- [85] 杨蕙馨, 田洪刚. 中国制造业技术进步与全球价值链位置演变关系再检验——一个技术进步和参与度的双门槛模型 [J]. 财贸研究, 2020, 31 (11): 27-40.

- [86] 杨连星, 罗玉辉.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全球价值链升级 [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7, 34 (6): 54-70.
- [87] 杨珍增, 刘晶. 知识产权保护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 [J]. 世界经济研究, 2018 (4): 123-134, 137.
- [88] 叶红雨, 杨清. 全球价值链下中国企业逆向技术外溢效应的实证研究 [J]. 研究与发展管理, 2013, 25 (4): 61-68.
- [89] 尹伟华.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美农业双边贸易分解分析 [J]. 世界经济研究, 2018 (6): 3-11, 135.
- [90] 尹伟华. 中国高技术产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和地位研究 [J]. 世界经济研究, 2016 (7): 64-72, 86, 136.
- [91] 尹伟华. 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与方式——基于世界投入产出表的分析 [J]. 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5, 36 (8): 12-20.
- [92] 尹伟华. 中美服务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程度与地位分析: 基于最新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 [J]. 世界经济研究, 2017 (9): 120-131, 137.
- [93] 余海燕, 沈桂龙.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全球价值链地位影响的实证研究 [J]. 世界经济研究, 2020 (3): 107-120, 137.
- [94] 余珮, 彭歌. 中国制造业双向 FDI 是否提升了其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地位 [J]. 现代经济探讨, 2020 (2): 64-74.
- [95] 张会清, 翟孝强. 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特征与启示——基于生产分解模型的研究 [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8, 35 (1): 3-22.
- [96] 张丽, 廖赛男, 刘玉海. 服务业对外开放与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 [J]. 国际贸易问题, 2021 (4): 127-142.
- [97] 张其仔, 许明. 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与创新链、产业链的协同升级 [J]. 改革, 2020 (6): 58-70.
- [98] 赵桐, 宋之杰. 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双重价值链分工——基于区域总产出增加值完全分解模型 [J]. 国际贸易问题, 2018 (11): 74-89.
- [99] 郑丹青. 对外直接投资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来自中国微观企业的经验证据 [J]. 国际贸易问题, 2019 (8): 109-123.
- [100] 周升起, 兰珍先, 付华. 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国际分工地位再考察——基于 Koopman 等的“GVC 地位指数” [J]. 国际贸易问题, 2014 (2): 3-12.
- [101] 祝树金, 戴璇, 傅晓岚. 出口品技术水平的决定因素: 来自跨国面板数据的证据 [J]. 世界经济, 2010 (4): 28-46.
- [102] ACEMOGLU D, JOHNSON S, ROBINSON J A. 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7, 91 (5): 1369-1401.
- [103] ANTIMIANI A, GERNAT L. Untapping the Full Development Potential of Trade Along Global Supply Chains: 'GVCs for LDCs' Proposal [J]. Journal of World Trade, 2021, 55 (5): 697-713.
- [104] ANTRAS P, CHOR D, FALLY T, HILLBERRY R. Measuring the Up-streamness of Production and Trade Flow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2, 102 (3): 412-416.

- [105] ANTRÀS P, CHOR D. On the Measurement of Upstreamness and Downstreamness in Global Value Chains [R]. NBER Working Paper, No. 24185, 2018.
- [106] ANTRÀS P, CHOR D. Organizing the Global Value Chain [J]. *Econometrica*, 2013, 81 (6): 2127 – 2204.
- [107] BARBIERI E, DI TOMMASO M, POLLIO C, RUBINI L. Getting the Specialization Right, Industrialization in Southern China in 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erspective [J]. *World Development*, 2020, 126: 104701.
- [108] BEVERELLI C, FIORINI M, HOEKMAN B. Services Trade Policy and Manufacturing Productivity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7, 104 (2): 166 – 182.
- [109] BI K, HUANG P, WANG X.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Low-carb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under the Global Value Chain: A Case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J].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 Social Change*, 2016 (111): 275 – 284.
- [110] CHANDRASHEKAR D, SUBRAHMANYA M H. Exploring the Factors of Cluster Linkages That Influenc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Firms in A Cluster [J]. *Economics of Innovation and New Technology*, 2019, 28 (1): 1 – 22.
- [111] CHEN C J. Developing a Model for Supply Chain Agility and Innovativeness to Enhance Firms' Competitive Advantage [J]. *Management Decision*, 2019, 57 (7): 1511 – 1534.
- [112] CHEN L, LUO S, ZHAO T. Financial Constraints, Trade Mode Transition, and Global Value Chain Upgrading of Chinese Firms [J]. *Sustainability*, 2019, 11 (17): 4527.
- [113] CHEN Q, SHEN Y. The Impacts of Offshore and Onshore Outsourcing on China's Upgrading in Global Value Chains: Evidence from Its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 Sectors [J].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2021 (59): 263 – 280.
- [114] CONNOR L H. Energy Futures, State Planning Policies and Coal Mine Contests in Rural New South Wales [J]. *Energy Policy*, 2016 (99): 233 – 241.
- [115] DEY B L, BABU M M, RAHMAN M, MISHRA N. Technology Upgrading Through Co-Creation of Value in Developing Societies: Analysis of The Mobile Telephone Industry in Bangladesh [J].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2019 (145): 413 – 425.
- [116] DOVIS M, ZAKI C. Global Value Chains and Local Business Environments: Which Factors Really Matter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J]. *Review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2020, 57 (2): 481 – 513.
- [117] FALLY T. Production Staging: Measurement and Facts [Z]. University of Colorado-Boulder, 2012.
- [118] FAN P. Innovation in China [J]. *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 2014, 28 (4): 725 – 745.
- [119] GAVIN B.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s Rare Earth Industry within and without the WTO [J]. *Journal of World Trade*, 2015, 49 (3): 495 – 515.
- [120] GIULIANI E, PIETROBELLI C, RABELLOTTI R. Upgrading in Global Value Chains: Lessons from Latin American Clusters [J]. *World Development*, 2005, 33 (4): 549 – 573.
- [121] HALASZOVICH T F, KINRA A. The Impact of Distance, National Transportation

Systems and Logistics Performance on FDI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Patterns: Results from Asian Global Value Chains [J]. *Transport Policy*, 2020, 98: 35 – 47.

[122] HAUSMANN D, HWANG J, RODRIK D. What You Export Matters [J].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2007 (12): 1 – 25.

[123] INDRAWATI S M, KUNCORO A. Improving Competitiveness Through Vocational and Higher Education: Indonesia's Vision For Human Capital Development In 2019 – 2024 [J]. *Bulletin of Indonesian Economic Studies*, 2021, 57 (1): 29 – 59.

[124] JOHNSON R C, NOGUERA G. Accounting for Intermediates: Production Sharing and Trade in Value Added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2, 86 (2): 224 – 236.

[125] JU J, YU X. Productivity, Profitability, Production and Export Structures Along the Value Chain in China [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15, 43 (1): 33 – 54.

[126] JU S, ZHANG J, LI S. Cooperation of Global Value-Added Trade Network: An Evolutionary Game Analysis [J]. *Transformations in Business & Economics*, 2020, 19 (3): 291 – 309.

[127] KOOPMAN R, POWERS W, WANG Z, WEI S J. Give Credit Where Credit Is Due: Tracing Value-added in Global Production Chains [R]. NBER Working Paper, No. 16426, 2010.

[128] KOOPMAN R, WANG Z, WEI S J. Estimating Domestic Content in Exports When Processing Trade Is Pervasive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2, 99 (1): 178 – 189.

[129] KOOPMAN R, WANG Z, WEI S J. Tracing Value-Added and Double Counting in Gross Export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4, 104 (2): 459 – 494.

[130] KUMARASWAMY A, MUDAMBI R, SARANGA H, TRIPATHY A. Catch-Up Strategies in The Indian Auto Components Industry: Domestic Firms' Responses to Market Liberalization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12, 43: 368 – 395.

[131] LAMPON J F, CABANELAS P, DELGADO G, JOSE A. Keys in the Evolution of Mexico with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in the Automobile Components Industry: The Case of Bajío [J]. *Trimestre Económico*, 2018, 85: 483 – 513.

[132] LANDESMANN M A, STOELLINGER R. Structural Change, Trade and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An 'Appropriate Industrial Policy' for Peripheral and Catching-up Economies [J].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2019, 48 (MAR.): 7 – 23.

[133] LEBDIOUI 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oving Up in Global Value Chains: How Malaysia Added Value to Its Natural Resources Through Industrial Policy [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020 (4): 1 – 34.

[134] LI B, LI J, DONG N, HUANG L. Industrial Transfer's Effect on Competitiveness of the Manufacturing: A Case of Zhejiang, China [J]. *The Singapore Economic Review*, 2021, 66 (3): 953 – 968.

[135] LOS B, TIMMER M P, VRIES G J. How Global Are Global Value Chains? A New Approach to Measure International Fragmentation [J].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2015, 55 (1): 66 – 92.

- [136] MANOVA K, WEI S J, ZHANG Z. Firm Exports and Multinational Activity Under Credit Constraints [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15, 97 (3): 574 – 588.
- [137] MENG B, FANG Y, GUO J, ZHANG Y. Measuring China's Domestic Production Networks Through Trade in Value-added Perspectives [J].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Input-Output Association*, 2017, 29 (1): 48 – 65.
- [138] MILLER R E, TEMURSHOEV U. Output Upstreamness and Input Downstreamness of Industries/Countries in World Production [J]. *International Regional Science Review*, 2017, 40 (5): 443 – 475.
- [139] OBASHI A, KIMURA F. New Developments in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Networks: Impact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J]. *Asian Economic Journal*, 2021, 35 (2): 115 – 141.
- [140] PANANOND P. 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Globalizing Subsidiaries Moving Up the ValueChain [J]. 2013, 19 (3): 207 – 219.
- [141] PAVLINEK P, ZIZALOVA P. Linkages and Spillovers in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Firm-Level Analysis of The Czech Automotive Industry [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16, 16 (2): 331 – 363.
- [142] PAVLINEK P.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Supplier Linkages in the Integrated Peripheries of the Automotive Industry [J]. *Economic Geography*, 2018, 94 (2): 141 – 165.
- [143] PONTE S, EWERT J. Which Way Is “Up” In Upgrading? Trajectories of Change in The Value Chain for South African Wine [J]. *World Development*, 2009, 37 (10): 1637 – 1650.
- [144] RASIAH R, MYINT M. Ownership,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and Exports of Garment Firms in Myanmar [J]. *Technolog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Economy*, 2013, 19 (1): 22 – 42.
- [145] SUN S L, PENG M W, REN B, YANG D. A Comparative Ownership Advantage Framework for Cross-Border M&As: The Rise of Chinese and Indian MNEs [J].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2012, 47 (1): 4 – 16.
- [146] TAM P S. Global Impacts of China-US Trade Tensions [J]. *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 Economic Development*, 2020, 29 (5): 510 – 545.
- [147] THAKUR-WEIGOLD B. Capability Mapping to Improve Manufacturing Network Performance: How A Factory Can Target Growth [J]. *Journal of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Management*, 2021, 32 (6): 1335 – 1356.
- [148] TIMMER M P, Dietzenbacher E, Los B, Stehre R, de Vries G. An Illustrated User Guide to The World Input-Output Database: The Case of Global Automotive Production [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5, 23 (3): 575 – 605.
- [149] WANG Z, WEI S J, YU X, ZHU F. Characterizing Global Value Chains: Production Length and Upstreamness [R]. NBER Working Paper, No. 23261, 2017.
- [150] WANG Z, WEI S, ZHU K. Quantifying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Sharing at the Bilateral and Sector Levels [R]. NBER Working Paper, No. 19677, 2013.
- [151] XIE Z Z, LI J T. Exporting and Innovating Among Emerging Market Firms: The Mod-

eratin Role of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18, 49 (2): 222 – 245.

[152] YANG Y, YANG S, LV X, GE T. China's Manufacturing Strate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aracteristics Comparison of Global Value Chains [J]. *Transformations in Business & Economics*, 2020 (19): 396 – 417.

[153] ZHANG A, HUANG G Q. Impacts of Business Environment Changes on Global Manufacturing Outsourcing in China [J].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012, 17 (2): 138 – 151.

[154] ZUTSHI A, CREED A, HOLMES M, BRAIN J. Reflections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Implementation in Furniture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tail & Distribution Management*, 2016, 44 (8): 840 – 859.

Global Value Chain Position Research: A Literature Review

HAN Yonghui^{1,2} MAI Jinghua¹
ZHANG Fan³ LUO Ruilin⁴

- (1. Guangdong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rategies,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420, China;
2. Institute of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3. Research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s,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006, China
4.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Trade,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006, China)

Abstract: The global fragmentation and decentralization of the product production and the profound evolution of the world have impacted the architectur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the position layout of the Global Value Chain is facing a significant impact. This paper takes 1942 Chinese and foreign literatures on Global Value Chain position before 2021. With the help of CiteSpace bibliometric research tool, both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are used to explore the research context and hot spot evolution of Global Value Chain position, We put forward the

logical framework of Global Value Chain position calculation. We then propose a framework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national pattern of Global Value Chain, upgrading strategies and identify the factors than would affect Global Value Chain position. We find that: (1) The Global Value Chain position calculation framework mainly includes two decomposition models and three mainstream measurement methods. Two decomposition models include total export decomposition model and production decomposition model. The three mainstream measurement methods are divided into Global Value Chain position index (Wang), Global Value Chain position index (Koopman) and Upstreamness index. (2) The national patterns of the Global Value Chain position are characterized by 'dominance' of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low-lock'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3)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Global Value Chain posi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endowment factors and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factors. The endowment factors include natural resources, human resourc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ere are three types of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factors, business environment, opening up level and domestic production supporting level. (4) The upgrading strategy of Global Value Chain posi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types, internal upgrading strategy and external optimization strategy. The internal upgrading strategy can be divided into endowment utilization strategy, innovation driven strategy and National Value Chain construction strategy. External optimization strategy mainly involves foreign investment, institutional openness and industrial transfer strategy. Our study provides a clear vision for the previous literature on Global Value Chain position and lays a solid foundation for future research in this area.

Key Words: global value chain position; international division; bibliometrics

JEL Classification: C19, F02



产业组织评论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Review

第16卷 第4辑 (总第52辑) 2022年12月
Vol.16 No.4 (Gen.52) Dec. 2022

ISBN 978-7-5218-4632-4

定价: 49.00元

ISBN 978-7-5218-4632-4



9 787521 846324 >